



Ri Mei
sheng huo
ce ying



4

日美生活侧影

王 悦 郭月芳 吴雪莉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日美生活侧影

王悦 郭月芳 吴雪莉

责任编辑 刘连峰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(联)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75印张 72千字

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800册

统一书号 3105·427 定价 0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作者王悦、郭月芳、吴雪莉三位同志都是华籍外人。吴雪莉同志一九四六年从美国来华；郭月芳同志是一九五六年从日本来中国的；王悦同志则是抗日战争期间，随父母从日本来华务农，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参加中国革命。前几年，他们分别去美国、日本探望亲人。本书所收集的文章，就是这三位同志在探亲后所写的观感文章。着重介绍了美国、日本人民群众的工作、生活情景。文章中所介绍的事实，只是他们所见所闻。作为一个侧影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、美国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，哪些是需要引以为戒的；也可以帮助我们具体了解什么叫资本主义，什么叫社会主义。所有这些，对我们的同志，特别是青年同志是很有意义的。

目 录

探亲札记.....	(1)
还是社会主义祖国好.....	(49)
三十四年前后.....	(91)
编后记.....	(114)

探亲札记

——我的两个祖国

河南省医学情报研究所 王 悦

一、我是幸运者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日本人把八月十五日叫做“停战纪念日”。说来真巧，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——日本无条件投降三十周年的这一天，我带着女儿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日本。

当我坐在舒适的中国民航波音七〇七客机的舷窗旁，看到秀丽而雄伟的富士山时，禁不住心潮起伏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人们说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，是日本人民的骄傲。对我来说富士山也是我的故乡，离富士山不远的甲府市就是我出生的地方。那里有难忘的母校和童年时期的朋友。

经过四小时飞行，飞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。我站在机场豪华的大厅里，环视衣着华丽的国内外乘客，好象来到一个陌生的异国，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故乡。三十多年来的变化令人惊讶。

我帮助那些来自中国东北的、不会讲祖国语言的日本同胞们办理了海关手续。当我走出大厅时，前来迎接我的亲属和政府职员早就等得不耐烦了。其实，日本海关手续并不复杂，只填写简单的卡片，行李不需打开检查，皮箱、手提包等放到传送带上，跟着它走就可以了。如果行李中有武器、剪刀之类的金属品，便会发出“嘀嘀”的警报声。海关人员立即走过来彬彬有礼地问：“可以打开检查吗？”。只要不带武器、毒品等禁运物品，他们不会给旅客添麻烦，所以不必慌乱。

海关看过我的护照，让我在三天以内到当地政府办理“外国人身份证”。我拿的是棕色护照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，我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日本侨民拿的是日本驻华大使馆发给的天蓝色护照。

回家的第二天，母亲带我前往埼玉县厅（相当于省府）和大官市政府进行礼节性拜访，对协助我办理去日本探亲手续的人们表示了谢意。同时顺便办理“外国人身份证”。埼玉县是开展日中友好活动很活跃地区。埼玉县知事畑和（相当于省长）和大官市秦市长都曾经访问过中国，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市长亲自送给我两本他的《访华回忆录》。他客气地说：

“我争取再去一次。到时候请你们多加关照。”

县厅给我送了纪念品。社会科的职员解释说：

“这是埼玉县的规定，给每一位从中国回来探亲的人都送纪念品。”

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说：

“平时日本政府官员架子大，对群众态度很傲慢。今天他们对你这么客气，我感到自豪啊。”

我对母亲讲：

“这是因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，我这个华籍日本人的身份也高了。”

母亲继续说：

“你真是个幸运的人，回来得正是时候。我们刚从中国回来的时候，人情薄得象一张纸，别说政府，连亲戚朋友也不肯帮忙。那时候为了活命，谁也顾不上谁。”

母亲逢人就高兴地说：

“这是我从中国回来的女儿，她的丈夫是中国医生。”

要是在解放以前，谁嫁给中国人，谁就是低人一等，就会受到社会的歧视，甚至父母也会跟女儿断绝关系。著名的世界语学者、国际主义战士长谷川照子就是因为和中国人结婚，遭受过辱骂和迫害。

我按规定办了“外国人身份证”。政府职员告诉我，政府仍承认我是日本人，可以换取日本人身份证。

我问他：“没有日本人身份，住在这里有什么妨碍吗？”回答是：“没什么妨碍。”在日本逗留半年期间，我把“外国人身份证”同护照一起锁在皮箱里，不带任何证件，自由自在地去旅行和探亲访友。

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建交，结束了两国之间不幸的历史。从此后，大批在华日侨、华籍日本人能够自由地回日本探亲

了。根据两国政府的协商，日本方面对“八·一五”以前来华，战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或定居者，不论其保留日本国籍还是加入中国籍，一律视为战争受害者，由日本政府负担全部路费。我和十三岁的女儿享受了这一待遇。

回家后不久，大官市政府社会福利科派一名职员，来详细了解了我母亲的收入和生活情况，然后拿出文件说：

“根据大官市社会福利条例，对从中国回来的人，在探亲期间每月发一些生活补助费。”又说：“物价又上涨了。这点补助，只够两个人的饭钱。不过我们只能办这么点福利。”

过元旦节时，市政府给我们送来了年糕、白糖等慰问品，我全部交给了母亲。母亲风趣地说：

“过去竞选市长，我从来不参加投票。下次投他一票吧。”

母亲常说我是个幸运的人。的确，我真是个幸运者。

一九四六年一月，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黑龙江省东兴县。那时，我们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男女老少都集结在一个村庄里，焦虑地盼望着回国的消息。我们已陷入了困境，快断粮了，饥饿和传染病威胁着这些被本国政府抛弃了的日本难民的生命。

在一个寒冷的深夜，我们被突如其来的马蹄声和脚步声惊醒。大家心惊肉跳，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在黑暗中渡过了一个不安、恐惧的夜晚。第二天清晨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条消息：昨晚八路军开进县城了，保安队逃走了。人们悄悄地

议论着：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？他们对日本侨民会怎样呢？傍晚，几个穿粗布军装的军人骑着大马走进了村庄。一个年轻人边走边喊话：

“我们是民主联军，是人民的军队。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是保护外国侨民的……”

这个年轻人讲的是地道的日语。有的人挤上去大胆地问：

“你是日本人吗？”

“是啊。我是日本人。”

八路军队伍里也有日本人。八路军是保护侨民的。这一消息一传开，人们都高兴得露出了笑容。

这时，我正在绝望中挣扎。日本投降后的混乱时期，父亲被迫给我订下了婚事。“未婚夫”是个比我大十几岁的酒鬼，而且在国内有妻子儿女。

东兴县解放后，民主联军号召青年参军。为了逃婚，我决心跟着部队走。父亲看我的态度很坚决，就把我托付给带队的丁人同志。我的幸运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使我摆脱了不合理的婚约，把我从绝望中救了出来，奇迹般地改变了我的命运。丁人同志是我一生难忘的启蒙老师，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中国革命和日本革命的道理。从此，我走上了光明的革命道路。经过党多年的培养教育，我终于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。要不是人民的军队救了我，我早就成了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牺牲品，也就不会有我现在的一切。

二、我的家

东京是日本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。高楼大厦林立，小汽车川流不息，街道两旁的橱窗里，商品琳琅满目，五光十色，对人们有着极大吸引力。由于人口拥挤，住房紧张，空气污染等原因，人们都喜欢住在东京周围的城市。早上乘电机火车（日本叫做电车）或开自己的小汽车去东京上班。日本人把这些东京周围的城市叫做“卫星城市”，把它们划入“首都圈”。

我的母亲和弟、妹都住在东京和它的卫星城市里。看看我的家就可以看到日本社会的一个侧面。

一九六三年父亲离开人世后，母亲带着回国后出生的小妹住在离东京很近的大宫市。她俩住的是最普通的小公寓，有卧室和起居室，另外有厨房、洗澡间和厕所。房子面积小，但布局合理，舒适、方便。室内有电话、空调、彩色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电吸尘器等。日本城市家庭已实现了电气化。这些说明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水平很高。母亲告诉我每月房租是一万五千日元（当时折合人民币一百元左右），这笔开支由我弟弟负担。

小妹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东京一家公司当职员。每天乘火车上下班，相当辛苦。月工资十万日元，每月给母亲交伙食费两万日元，再除去保险费、交通费、社交费、服装费、化妆费等，剩下的就不多了。难怪日本人说：女孩子工作就是

赚个买袜子钱。

当时，六十五岁的老母亲在大宫市综合病院骨科病房做清洁工人。每月收入六万日元，一天工作七小时，每周工作五天半，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休息。每天下班后，到附近的超级市场买食品，回来自己做饭，生活比较方便。医院清洁工人不占医院编制，是清洁公司派去的，由公司发工资，请一天假，扣一天工资。

在日本，母亲的工资收入是低薄的。但是她对自己的职业十分满意，象老黄牛似的埋头苦干。连我这个三十多年未见过面的女儿从国外回来探亲，她老人家也舍不得多请几天假。据说，她曾吃过请假的亏。我二妹生孩子时，母亲请一个月的假去照顾她。结果母亲的工作被别人顶替了，她只好重新找工作。

母亲是渔民的女儿，幼年丧父，十几岁就到印刷厂做工。十九岁嫁给我父亲，一生为生活奔忙，吃尽了苦头。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，父亲失了业。一九四二年的春天，全家六口人背井离乡，漂洋过海，来到中国东北的移民开拓团从事农业生产。过了四年，父母又带着年幼的弟、妹，空手回到因遭受美国飞机轰炸，而变成一片废墟的日本。经过十几年的挣扎，好不容易重新安家立业。因此，母亲深深地懂得这六万日元的工资来得多么不易。

母亲今年七十一岁了，目前靠养老金维持生活，还有儿女们也照顾她。晚年还可以说是比较幸福的。

我唯一的弟弟大学没念，就到一家建设公司当工人。到

三十多岁才成家，用父亲留下的遗产在埼玉县浦和市盖了自己的住宅。日本男子，如果自己的工资养不起妻子是不敢结婚的。所以一般都是晚婚，先立业，后安家。婚后更不敢生那么多孩子。弟弟今年四十九岁，只有一个念高中的女儿。他干了二十多年，去年才有了“工地主任”的头衔。我在他家时，他每天起早摸黑下工地干活，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，默默地躺在“榻榻米”上，很少讲话。

弟媳很精干，她不工作，但在家里用织毛衣机给人家织毛衣。她织的毛衣漂亮极了。这个收入可以购买一家三口人吃的大米，能减轻我弟弟的经济负担。另外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担任PTA（教师家长协会）的副会长。

大妹妹靠政府的奖学金念了大学。日本的奖学金也不是谁都可以享受的。只有勤奋学习，成绩特别优秀的极少数尖子学生才能享受。日本大学生的开支很大，光靠奖学金不够用，全家省吃俭用，供她念大学。一般劳动人民家庭供不起两个大学生，比她小两岁的二妹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，考进了学制短、学费少的护士学校。

大妹妹夫妇都是教师，住东京一所现代化的高级公寓。这一所公寓的一楼是食品店，二楼以上住人，共七层，没有楼梯，全靠自动电梯上下楼。当时每月房租是五万日元。表面上看来，生活得很富裕。

妹夫开办一所补习学校。妹妹每天下午从学校下班回来后，还赶到补习学校去上课。她为了备两个学校的课，常常工作到夜里十一、二点。为了工作，也是为了生活，一怀孕

就做人工流产，一个孩子也没生。

二妹的情况好一些。护士学校毕业后做了几年护士，二十五岁结婚，生孩子后退职，有二男一女。

二妹夫是工科大学毕业生，在东京某公司当部长（相当于处长）。他们在埼玉县岩槻市买了日本式两层小楼房。我去时刚搬进新居。听说妹夫在工作时很严肃，待人很严厉，但下班后好象换了另一个人似的很随便。我跟他开玩笑：

“部长先生，你有这么漂亮的房子，我妹妹可享福啦。”

他认真地说：“大姐，您是中国人，不知道我们日本人的苦楚。这些房子都是住宅公司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卖给住户的。我现在三十五岁，再干二十年，等到我五十五岁退休的时候才能还清这一笔债。那时候，儿子又该买新房子啦。象我这样靠薪水谋生的人，一生最大的欲望就是能有自己的房子啊。”

“那你已经满足了吧！”。

“不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有个日本车，我还想买一部奔驰车。明天还不一定生产出什么新产品。别人有了，我也想要，所以还得拼命干。”他承认干工作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来满足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。

二妹虽然是家庭主妇，但每天过得相当紧张。清晨不到六点就起床，准备全家的早点和丈夫带到公司的午饭。日本的许多企业、机关不设食堂，下馆子又很贵，所以自带午饭

去上班，成了日本人民的习惯。

七点，二妹开着小汽车把丈夫送到火车站，回来后同孩子们一起吃早点。白天做一大堆家务事。傍晚，一接到丈夫的电话，又得开车去车站把他接回来。晚饭后记“家计簿”。

“家计簿”是家庭账本。为了精打细算过日子，家庭主妇把每天的开支情况记下来，到月底算总账。妹妹常抱怨：

“我比上班还忙，可是没有工资，也没有星期日。”

三妹出生在中国。我参军离开家时，她只有两岁。到一九七五年我们见面时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了。

她女儿亲切地叫我“中国姨妈”。一再叫我们去她家住几天。但我母亲不让我们去。

“你们去不得。她家很困难，造船厂倒闭，你妹夫失业了。你们去不是添麻烦吗？”

天真的小外甥女不断地来电话：

“我已经和老师、同学讲过，中国姨妈来我家做客，您再不来，他们会说我撒谎。”

我同母亲商量决定，元旦节前去三妹家住两天。到了横滨，三妹告诉我，她们住的这一块住宅区是填海造的人工陆地。日本国土狭窄，山脉多，平原少，为了民族的生存，只得移山填海，扩大陆地，建造新城市。

三妹她们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住在日本式公寓里，只有两个房间，非常拥挤。一间是大人住，另一间是两个孩子住。白天当起居室，夜里当卧室。日本式房屋进屋脱鞋，夜里把卧具从壁橱里取出来，往地毯上一铺就睡。这种日本房屋对

劳动人民来说很方便。

她家有一辆漂亮的黑色小轿车。人们也许会问：失业工人还要小车干什么呢？日本很多工人、职员都有自己的汽车，农民也有小型卡车和小轿车。汽车既是全家的交通工具也是生产工具。在那个社会里，没有汽车寸步难行。我看到三妹夫开着汽车去当零工，又开着汽车去找工作。生活的风浪磨练得他生活能力很强，很能吃苦。

他培育许多盆景，本来是为了消遣的，失业后把这些盆景拿到市场上出售。他笑着说：

“这也能维持一段生活哩！”

三妹在商店里当会计。因为有个不满三岁的小女儿，每天等大女儿下午放学后去上班，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一点。

三妹夫对中国很友好。喜欢购买中国商品。他的劳动布裤子、女儿的睡衣都是上海货。他最羡慕中国的工人没有企业倒闭和失业的威胁。他很想到中国来当工人。

三、日本人民的对华感情

来到日本，我深感日本人民是热爱中国的。他们对中国很关心，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感到内疚。

一位政府职员告诉我：

“战争时期我在山西太原工作，在那里日本军队干了许多坏事。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。中国是战胜国，完全有理由向日本索取赔偿费，但中国一分钱也没要。除了中

国，别的国家是绝对做不到的。”

年轻的职员说：

“中国、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吧？可是我喜欢中国，不喜欢苏联。苏联占领日本的北方领土，蛮不讲理。”

有一次，我们坐出租汽车外出，当我母亲谈到我是从中国回来探亲时，司机立即回过头来向我致意说：

“我也在中国呆过。那里的变化很大吧？真想回去看一看。”

还有一次，我们乘坐从东京火车站到江之岛的游览巴士（公共汽车），欣赏日本的风光。车上的导游工作人员听到我和女儿讲中国话，便走过来亲切地问：

“您是从北京来的吗？”。她们说北京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回答“是的”。她表示热烈欢迎，并一定让我向车上的游客们讲几句话。

我见到一些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服务过的日本朋友，他们深深地怀念着中国，怀念着并肩战斗过的中国战友。

一位叫白田良子的朋友从关西打来长途电话，用日语和汉语讲话，并用汉语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让我听。

另一位叫田中民子的朋友说：

“在中国工作几年使我懂得了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，怎样生活。这是很宝贵的。我周围的人们都说，从中国回来的人性格顽强，办事能力强。你看，我没给中国丢脸吧！”

这位朋友是孤儿，双亲的遗骨都埋在中国。她的姐姐、妹妹迄今下落不明。她们也许成了侵略战争的牺牲品，在异国